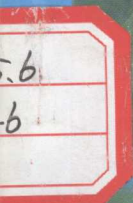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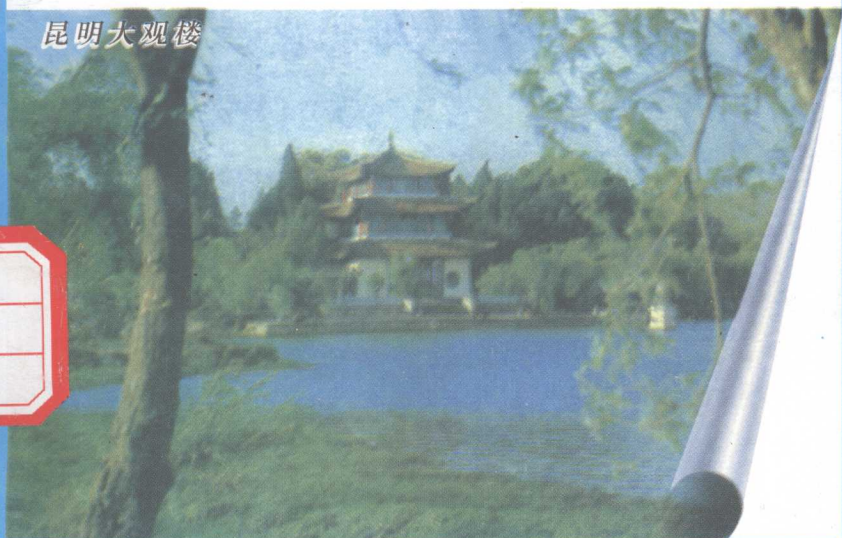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3辑

刘 鄂 小 传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昆明大观楼

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3辑

刘 鹦 小 传

刘 蕤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粤新登字08号

责任编辑 邱江生

封面设计 章 雯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3辑

刘 鄂小传

刘 蕤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: 510600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70印张 1100千字

2002年10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2次印刷

ISBN7—80521—845—5/K·115

定价: 136.00元(全20册)

目 录

- 一、立志圣贤..... (4)
- 二、投效河工..... (15)
- 三、实业救国..... (19)
- 四、文化整理..... (42)
- 五、小说传世..... (56)
- 六、客死迪化 (103)

刘鹗（1857—1909）从来没有希望以小说成名，却因为一部《老残游记》而蜚声中外、享誉人间，而刘鹗本身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，以及《老残游记》具有的高度艺术性、思想复杂性，甚至偶而还具备的神秘性，至今仍然吸引人们对它投以极大的兴趣与关注。在晚清小说史上，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引如此莫衷一是的评价，其尖锐、复杂的程度，恐怕首推的就是刘鹗和《老残游记》了。

刘鹗生活在内忧外患频频的清朝末年，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，《辛丑条约》的签订，清政府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，整个中国陷入危难之中，如“棋局已残”。伴随着晚清政治腐败和外国列强的肆意瓜分掠夺，必然地引起了社会心理和文化思潮的激变，各路有识之士纷纷致力于寻找一条挽救民族危机的良途捷径，刘鹗可以说是其中颇为努力的一个。他曾亲自参与治理黄河水患，又希望能以实业救国，耗费大量心力于开矿山、筑铁路和

兴办近代新式工商企业，虽然处处碰壁，却始终孜孜无悔；同时又致力于文化整理和保存的工作，除了他创作的《老残游记》，还存有甲骨文研究、音乐、数学、医学等众多领域的论著，而这一切社会事业的产生根源和指导思想，则在于一个鲜为人知的思想学派——太谷学派，我们必须透过它，才能真正地理解刘鹗，并理解刘鹗一生的作为，甚至才能真正地理解《老残游记》。

刘鹗于清朝咸丰七年九月初一日（1857年10月18日）出生在江苏省六合郡，因为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梦见一只大鹏鸟，就取名梦鹏，又名孟鹏，字云搏，后来自己改名为“鹗”，字铁云，又字公铨。

刘家的远祖是南宋的抗金名将刘延庆、刘光世，与当时的岳飞、韩世忠、宗泽等齐名，是广大军民心目中颇有威望的爱国将领。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考中进士，长期在河南作官，从祥符县知县、到汝宁府知府、开封府知府、南汝光道，开归陈许道等等，河南几个实缺道几乎都做过，但一直到退休时才加了布政使的官衔，一时间颇有廉能的美名，后来，他在江苏淮安购置田产，在那里安居立业，以后就长期住了下来。

刘鹗是刘成忠的小儿子，四岁起就跟从姐姐识

字读书，习诵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往往读上几遍就能够背诵，十分聪慧。后来一直随宦在父母身边，曾经有过一位老师叫赵君举，是八岁时父母为他所请，据说是一个不太得志的才学之士，颇有一些不肯媚俗的耿介，对刘鹗或多或少总有一些影响，加上刘鹗本身就天性不喜约束，斥弛不羁，一直以来就对功名文章不甚了了，只喜欢钻研一些可以经世救民的实学，所以秀才是早已考中了，而一生中参加过的两次进士考试：第一次是20岁那年从河南回到淮安，当年秋天在南京参加的乡试，落第而归，还有一次则在30岁时，考了一半就退场了，对功名淡漠如此，由此可见。然而对河工、算术等实用之学的兴趣，刘鹗则早已有之。这种偏好，大概多少与家庭的影响也有一些关系，像河工就是刘鹗的家学，并且刘氏家族的传统，是颇以民生为计的，譬如刘成忠自己，虽然科举出身，性格拘谨，但胸怀民瘼，在河南做了几十年官，几乎都在黄河下游的灾涝之地活动，还自己搞河工、绘算等等，有不少实践经验；而且相传还有单骑入捻军兵营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说退捻军，使开封解围的故事，这种自人道主义出发的对人民的同情心，必然对刘鹗有一定的熏陶。大时代的环境，小家庭的氛围，都在刘鹗的青少年时

期对他的性格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影响。

一、立志圣贤

然而对刘鹗影响最为深远的，则是其后对太谷学派重要传人李龙川的拜谒。

20岁那年乡试落第，刘鹗从南京赶回淮安，途经扬州，遇见了李龙川。这一次遭遇，彻底地改变了刘鹗的一生，他的人生观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正因为他吸取了这个教派的思想，成就了以后一番影响颇巨的社会事业；正是为了更好的表达学派的理论，《老残游记》中的一些部分充满了神秘的“玄”学色彩，使这部小说以异于同时代文学的面目出现于世。这一切行为的动机、旨归，信仰的因素，唯有理解了太谷学派的历史与思想，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。

太谷学派的创始人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安徽石埭（一说池州）人周星垣（号太谷）。周大谷出身富有，喜欢四处游学，求访名师，曾经从福建人韩子愈、江西人陈少华两个人那里学习了不少有关佛、道的知识，但又不满足于此，继续访学，从他的祖先周敦颐“志伊尹之志，学颜渊之学”的遗训中恍悟到儒

学的精髓，继而深入钻研，豁然有所心得，自成一派之学，韩、陈二人反而转过来拜周太谷为师。后来人研究太谷学派，有的说是出于王阳明，有的说出于福建莆田林兆恩的三一教，众说纷坛，其实都不是，按照学派中人的讲法，是直继伏羲、周文王、周公、孔子的心传，而最后的一个祖师又是宋学中的周敦颐。周太谷自号空同，在清朝末年太谷学派通常又称作“空同教”、“空同”二字又写作“崆峒”，学派中人则自称“空同弟子”或“空同子孙”。

道光初年，周太谷云游扬州，以精通儒、释、道三教最高密意的得道高人的形象出现于世，卓言独行，广为传诵。并接纳了张积中、李龙川两位青年学者为弟子，太谷学派正因为张、李二人后来在南北广收门徒、传道授教，扩大了影响，这两位青年的拜师，可以说是太谷学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当时两个人都少年气盛，颇有才名，听到周太谷的种种传说以后，专道从家乡仪征赶往扬州论辩，被周太谷的学问所倾倒。尽管真正跟随周太谷学习的时间才几个月，周太谷却在临终以前，决定由李龙川传道于南，让张积中还道于北，宣传他的学说，作为他的衣钵传人，而这两个弟子也没有辜负周太谷的期望，弘扬了太谷先生的学说，真正建立了太谷

学派。

张积中（1806—1866）字石琴，号雨溪，又号白石道人，拜从周太谷得道后号子中。李龙川（1808—1885）本名光圻，字晴峰，号平山，道号子圻。起初一直在仪征隐居，钻研太谷的学说。1856年，太平天国攻陷仪征，他们就离开故乡，按照周太谷所指定的，张积中携一家老小北迁山东，定居在山东长清和肥城之间的黄崖山中，所以学派中人又称黄崖夫子。在那里，他一方面公开讲学，广泛结交，十年时间，前后收授门徒达万人以上，仅仅全家移居黄崖山跟从张积中筑寨而居的就有两千家。那时候山东也是捻军活动相当频繁的地区之一，盐枭的活动也十分猖獗，出于自卫的目的，张积中在那里筑了石寨墙，又筑了文学房、武备房、璇玑洞、太玄坛，以避免骚乱和防止侵扰；同时为了维持山中的生活，就在山中屯垦，并开设泰运通等四家商号，从事国内的区间贸易，称之为“辅翼圣功”，安养山中的弟子、眷属。黄崖山中的情景，比起外面的乱世，无异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，没有不平等的等级关系，只有师生同学，教耕合一，过着安定而宽裕的生活，宛如一个小小的大同世界。但是这样的生活，终致于为地方官员所猜忌。同治五

年（1866年），山东巡抚阎敬铭借口张积中有传“邪教”的可能，认为他们有“通匪”嫌疑，图谋造反。张积中当然并没有要谋反的意图，但对于阎敬铭无中生有的捏造和由此出发的招降，则采取了义正辞严的回答。终于，清兵大举围剿黄崖山。攻破寨门之后，张积中并没有亲自率众反抗，也没有转移阵地，而是全家自焚，以此来抗议对他的诬蔑，为自己最终的“三纲五常”观念作一次行动上的辩白。山上的弟子，一部分也追随他自杀身亡，另一部分则在抵抗失败后被杀，相传当时的男男女女，都“形色洒然，笑语如故”，一时间传为异事’。这就是近代史上颇为著名的“黄崖教匪案”，太谷学派中人称之为“丙寅（1866年）之变”。为什么 2000 名弟子如此视死如归？一直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，解开这个谜，必须对太谷学说有一定的深入了解。

自“黄崖教匪案”发生以后，太谷学派的活动就变得谨密起来了，尤其是北方一派，更是几乎消声匿迹，几乎没有再听说进行什么大的学派活动，而只有南方李龙川一脉仍然隐秘却又兴隆地发展着，同时联络黄崖教案后留存的太谷学派北宗弟子，以期促成南北合宗，重振太谷学派。刘鹗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遇见了李龙川。

李龙川的活动地点主要在扬州、江都、泰州一带，有时也在上海、南京等地传道讲学，因为他后来在江苏江都县设立龙川草堂教授弟子，所以学派中人又称之为龙川夫子。其弟子分布区域极为广泛，而且有许多政府官员，他们会为李龙川提供和筹措一定的活动经费。刘鹗和李龙川的第一次相遇，是在他20岁乡试之后途经扬州的时候。李龙川对儒家思想的侃侃而谈，对佛道两家学说的广征博引，完全吸引了一直在对人生进行思考的刘鹗，从此太谷学派的思想成了刘鹗一生的信仰和行为圭臬。对于这种人生思想的巨变，他曾经写有一首《述怀》诗（《铁云诗存》）：

余年初弱冠，束脩事龙川。
虽未明道义，洒扫函丈前。
无才学干禄，乃志在圣贤。
相从既已久，渐知叩两端。
孔子号时中，知时无中偏。
万事譬诸物，吾道为之权。
得权识轻重。处久循自然。
因物以付物，谁为任功愆。
此意虽浅近，真知良独难。

灵台有微滓，一跌千仞渊。

刘鹗本来就对“干禄”之道颇为厌腻，不喜欢功名学问，一直来就希望能够济世救民，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，成就一番圣贤事业。应该说，这是偏离了传统的正统儒学观念的一种人生追求。而李龙川讲授的太谷思想，则自称为非佛非道的儒家学说，并且是直承孔孟心传的真儒学，而非假儒学，那么，在真假儒学之间，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这要从太谷学派的基本思想说起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了解刘鹗之所以选择此儒学，而摒弃彼儒学的原因，同时由此而了解刘鹗一生的思想渊源和毕生的人生志向。

太谷学派除了叫空同派以外，又有一个常用的名称叫“圣功”，学派中子弟则又称“圣功弟子”，但什么是“圣功”呢？

“圣功”一词取自“周易”的“蒙卦”，所谓“蒙以养正，圣功也”，讲孔子学说中包括的内圣之道，即自我修养的问题。养圣功的目的则在于：一，扩大人的认识能力，使自身能更深刻并全面地认识和支配客观存在；第二，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感慨于生命的消逝，故而孔子有“逝者如斯夫”的叹息，那

么，人到底能不能不死呢？按照太谷学派的观点，也能也不能：物质的人是要死的，从来没有见过不死的人，但组成人的本体的微粒是不灭的物质，这一点已经为现代物理所证实，它们的运动就是人类的活动，也有不灭的能量运动，从这个意义看，人又是根本不死的，就像能量守恒定律里说的，只能聚合和分散，聚合起来就成为人，人死了也就分散而组成其他的东西。太谷学派认为孔子的思想，包括内圣与外圣两大部分，除了我们通常所知的伦理道德思想，治世做人之道以外，还有重要的内圣之道，也就是性命思想，并由此实现上面所说的两个目标。

李龙川的另一个得意门生黄葆年，曾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农历九月，在苏州设立归群草堂，在那里讲授太谷学派的理论思想。这位黄葆年先生在归群草堂挂了一幅对联：“立言立功立德，希贤希圣希天”，下联讲养圣功的目的所在，并要求大家先要成为贤人，再进一步达到“大而化之，子为圣”的境界，最后再达到与天地合一，由希天而配天；上联则是方法和手段，人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种种境界，是因为人的心识能在某种纯净状态对自然界发生作用，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有限，都会在自然界中留下一定的能量运动的痕迹，只是久暂、大小

各不相同，比如陶渊明的文、杜甫的诗、王羲之的字，纵使一技之长，也会引动人们的敬仰之心，而这份诚笃也具有一定物理作用，能对拥有这一技之长的人的心识共鸣而发生强化作用。所以太谷学派的“圣功”理论认为个人的生命要得以长存，就一定要先活在群众心中，把自己在社会中的每一份责任承担起来，做好每一份工作，就能够“不出家而成教于国。”就像我们经常说的“永垂不朽”，在太谷学派中人看来，便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。它究竟是否具有实在的意义，要留待科学的证明，但这个观点对于刘鹗的一生活活动则确实具有了极大的推动力，使得刘鹗兢兢业业地致力于救世事业，毫无推咎之心。这样的修养，从客观效果来说，应该是对现实社会有利而无害的。

太谷学派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解释：孔子提倡孝悌，在《论语》之中，弟子问孝的事情很多，孔子总是因材施教，对症下药，作了五花八门的回答，但总的来说，都是要人孝顺父母。这本来只是一种伦理道德修养，太谷学派的解释中却把它上升为一种哲学行为，认为人受生于父母，父母又受生于父母的父母，以至无始生来的父母，按照自然发展规律，最终人是受命于“天”，而只要孝顺父母，

这份孝心的存在会一点点上达而与天道感应，就像上楼梯一样，一层一层的台阶走上去，无论是哪一层楼，总会走到楼顶，而且孝顺往往出自人的自然亲情，较其他修行方法容易做到，所以孝顺是达到希天配天的捷径。因此李龙川的诗钞中将歌颂尧舜大孝的“东夷操”选为第一首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

而周太谷的《痛心句》则对悌有了更为独特的解释，认为悌可以说是孝的扩充，兄弟与自己是同气连枝，爱护自己的兄弟也就是孝亲的旁通，也就是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。刘鹗一生对自己的兄弟刘渭清十分友爱，大概与此也有一些关系。

至于“忠”，人们通常的错误理论是认为指对皇帝的专门效忠，太谷学派的理论对孔孟学说的真正含义进行了重新挖掘，否定了如一些传统儒生所说的忠是为封建统治者效死卖命的观点，认为它实质上是指做人的态度，应该如曾子所说“为人谋而不忠乎？”做任何事情都要自我反省，全心全意，实心实意，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愧于人，做到“行一不义，乐一不幸而得天下，不为也。”这就是养浩然之气。

所谓“恕”，就是要将心比心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天下人的思想愿望都是差不多的，遇到什么事情，我想怎么对待，别人往往也相差不远，以

一颗无私无我，毫无怨恨的心去推想别人的心情，才能够彼此理解，也一定可以真正理解。

这种忠恕仁义的思想，应该说是贯穿了刘鹗的一生。我们单单从大家比较熟知的《老残游记》一书中，也可以看到在刘鹗的心里并没有那些人为的等级观念，只是本着平等的思想，心怀民瘼，总是为他人计谋，确实如翠环说老残的一样，有着一副菩萨心肠，追求的是“天下为公”的境界，甚至要“公”到极点，而要求实心实意做事这一点，又使得刘鹗对宋儒多少有些微词，对那种口言仁义道德，心存高官厚禄的假道学和封建统治者的帮凶充满了厌恶。

李龙川要求他的学生“度尽众生，方许成佛”（《观海山房追随录》），就比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思想更进了一步，认为无论穷达，都要进入社会，根据自己的条件，或者事功，发展功名事业；或者立德，以德行为大众树立榜样；或者著书立说，来教化芸芸众生，在形迹上却并不拘泥。而只有把这个原则贯彻到底，才能够既拯救他人又拯救自己。刘鹗在那个内忧外患频繁的时代，很快地接受了龙川夫子的教诲，接受太谷学派的思想，对他这样一个自幼就开始寻找救世之道的青年而言，